

读者参考

丛书

109

今天怎样改革

◎正在改变世界的五大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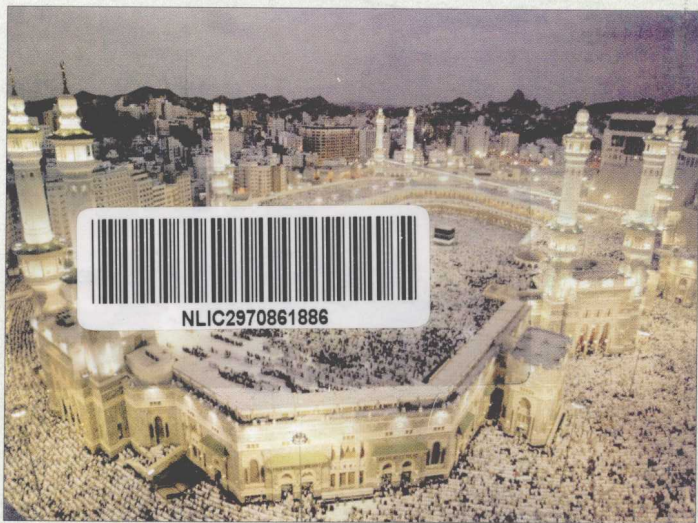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中国悄悄放宽外资进入股市限制 ◎姚明：我在找自己的信仰

◎我们为什么欣赏抽象画 ◎风雨过后看重庆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109



NLIC29708618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怎样改革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3. 2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ISBN 978 - 7 - 5486 - 0480 - 8

I. ①今…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中国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857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编辑部联系。

今天怎样改革

读者参考丛书(109)

2013 年 2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天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021-64084572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 - 7 - 5486 - 0480 - 8/Z · 33

定价:16.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109)

今天怎样改革

目录

今天怎样改革	1
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5
国民幸福源于社会平等	3
为什么要反复讲生命原则	12
解读十八大后重要人事变动	17
解放军高级将领调整完成	23
全球增长的严酷现实	28
正在改变世界的五大理念	31
新军事战略显示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	21
把脉中国经济大问题	36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悄然进行	40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最大挑战	42
外商投资与国际税源之争	45
中国遭遇 QE3	48
银行凭啥拿走实体经济大部分利润?	55
分配改革应以开门立法杜绝干扰	47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51
养老金十年收益跑输 CPI	54
创业板三年记	58
中国悄悄放宽外资进入股市限制	30
股民,你幸福吗	63
理性看待房产税改革	65
楼市告急 房地产商都干什么去了	70
无锡楼盘一降价,当地政府就恼火	75
24 种方式爱你的父母	78
城市男人的多样性情	79
金钱第一还是爱情第一	41

中国式相亲如同交易	64
知性太太, 掉头回家	82
女人想拥有一切? ——早点生孩子!	61
汉学家马悦然	86
韩素音: 在不断寻根中走过	90
邱晓华转身	26
冯友兰笔下的蒋介石	108
林昭与张元勋	198
越没有“我”越快乐	93
安全感	103
青春不能错过什么	105
低调也是一种智慧	107
比未知更可怕的是预知	109
说说处置财富的态度	94
中国人的“外包”生活	110
医疗服务不能再迟钝下去了	112
质检为什么检不出食品安全	115
逃离的白衣天使	118
吴良镛: 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	122
中国建筑设计缺少节能意识	85
资中筠: 中国教育不改变, 人种都会退化	127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	133
“重心”是文学教育	131
北大哲学系的冷热 20 年	52
姚明: 我在找自己的信仰	139
林丹回忆: 失败与启示	145

音乐为什么让我们感动	151
海顿的钢琴曲	153
文艺电影遭遇理科生“找茬”	157
高智商电影：虐心脑力赛	165
我们为什么欣赏抽象画	160
莫言的演讲(片段)	155
黄裳先生和他的散文	171
“九一八”爆发时中国为何孤立无援	176
《旧金山和约》出笼始末	180
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	185
中国式“被耽误”	188
不相信	190
钱不该买什么	195
勤劳是一种美德吗	200
他也可以是我	50
刑法罪名“盲点”争议	73
劳动合同法修改年内二审	164
南极暗藏巨量甲烷或加剧全球变暖?	203
“战争碳排放”：全球变暖的真正祸首	205
国外城市防洪减灾的智慧	210
人类仍在进化的证据	212
年轻一代离科学越来越远?	57
你所不知道的航空知识	214
美军为何一直是世界军事的霸主	178
锋芒外露的日本海军	183

上海与北京	216
风雨过后看重庆	98
“大苏州”背后的城市合并潮	168
“马家千金”的低调生活	169
台湾经济:大陆的拉动力在弱化	191
当日本人在改变	220
大亨与大使	222
中国式公与私	225
三一集团详解状告奥巴马幕后隐情	202
欧洲人为什么爱麻将	144
美国人的世界观	135
美国女人:婚姻不是人生归宿	226
英国人的旅游观	227
电车上的俄罗斯	228
国外如何解决看病难	233
被误读的北欧福利模式	231
行政审批改革:改皮毛更要改骨头	137
官本位调查:超七成人认同有钱不如 有权	76
“罚款财政”疾行	236
近八成贪官“边腐边升”,平均九年后 才案发	238
落后地区政府规模较大	49
医生眼中的医改	239
营养学家的养生之道	187
排名前十的健康习惯	126
长期服药别忘补充营养素	247
你的人缘好吗?这对长寿很重要	237
别等退休了才顾健康	245

多国研究发现防癌有八种新方法	89
六十补心气	248
各科医生发出的健康忠告	120
走遍世界选购最好的中成药	242
药物掩盖病情——用药不得当， 病情出假象	234
感冒乱服药，不如休息好	69
老祖宗留下的长寿食物	218
医生不愿吃的五种食物	117
“吃掉”运动疲劳	56
早餐 ABCD	132
警惕饭后“八凶手”	246
最便宜的九种防癌“处方”	224
40 岁后要常检查	84
用力咳嗽能自救急性心梗	130
蔬菜在美国成为“处方药”	219
封面图片 朝覲	
选自《百科知识》，文见第 16 页。	

今天怎样改革

□李稻葵

21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已进入有限权威时代。在有限权威时代,政府及其决策者正式的权力并不一定减少,决断力和执行力却明显受限。在有限权威时代,学者自己的权威也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如何推进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呢?这些问题已转换为如何识别社会上多数人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识别推进社会改革的约束条件。据此,我们讨论改革必须从社会的基本偏好入手,不妨称其为中国改革的社会禀赋。这种禀赋概括地说包括三大变量。

第一大变量是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也就是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的能力。举例来说,民众在一个波动的资本市场中的运作能力在不同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香港民众明显比内地民众更理性,他们更懂得如何应对波动的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

第二大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较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不同的社

会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度上的选择是不同的。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社会更强调个人自由,而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也许更加强调社会秩序。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民众更加注重秩序。当然,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较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

第三大变量是政府的能力,是指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力极强。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比较高效地贯彻执行一套经济体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程度的提高,这一变量会相应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厘清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在面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方面,中国的社会禀赋仍然处于演进过程中。普遍说来,中国民众不如长期市场经济经验的发达国家

的民众理性度高。

在对秩序以及个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受封建传统以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应该说比美国等国家的民众更加偏向于社会秩序。同时,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也是参差不齐的,比如在高考方面执行力度比较强,腐败比较少,但在其他方面则远非如此。

给定了这些社会禀赋,再来看中国需要何种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各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地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都和中国更接近,要仔细研究。

其次,一个应该没有太大争议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放权,应该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江浙

一带的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相关改革不妨先行一步。有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实际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地立法搞改革,即便所立之法可以执行,其效果也不一定好。

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中国民众的社会禀赋不断演进,市场理性程度不断提高,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不断改变,政府的执行力也不断改变——改革本身事实上就是在不断推动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今天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的改革方向,从而以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这样也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可选择的余地,而企业的选择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积极性与效率。

(摘自《舌战中国:21世纪属于中国吗?》,[美]亨利·基辛格等著,中信出版社)

今日说法

“你的浙 CAG670 车已严重妨碍行人过往,请自觉接受罚款。”

——这是一位温州市民手写的一张“白条罚单”,所罚对象是鹿城管管与执法局,该局执法车辆停在人行道上。

国民幸福源于社会平等

[英]斯基德尔斯基

文章指出,人们看待经济增长的态度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更加平等的社会将增加人们的满足感。

不丹国王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更加幸福。他说,政府的目标应当是使民众的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最大化。这种强调幸福的新态度究竟代表着一种转变,抑或只是一时兴起?

事实证明,经济增长是极其捉摸不定的,因此政府应当降低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这一点显而易见。预计欧元区经济今年将不会有增长。英国经济正在收缩。希腊经济已经缩水好几年了。就连中国经济也趋于放缓。为什么不放弃经济增长,享受我们眼前所拥有的?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增长复苏,这种情绪将烟消云散,因为这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人们看待经济增长的态度依然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人们希望在未来降低经济增长作为一种衡量指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富裕国家。

GNP 并非适当指标

阻止人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因素是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我们能否继续保持过去的

增长速度,同时又不会危及我们的未来?

上世纪70年代,当人们开始谈论增长的“自然”极限时,他们指的是即将发生的食品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枯竭。最近的讨论转移到碳排放问题上。正如2006年的《斯特恩评估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要想以后不被热死,我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现在的经济增长。

有趣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人口问题是一个禁区。地球上的人口越少,全球变暖的风险就越小。然而,富国政府不愿接受人口自然减少的现实,他们大量吸收移民,以压低工资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结果最近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呢?

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1974年,经济学家罗伯特·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

人类命运？一些实证证据》。在对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自我评估的幸福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后，他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或许并非如此。

伊斯特林发现，当收入超过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之后（足以满足基本需求），幸福和人均 GNP 并无关联。换句话说，GNP 并非衡量生活满意度的适当指标。

分配制度更加重要

这一发现令人们更加努力地研究替代指标的设计。1972 年，两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引入了一种被他们称为“经济净福利”的指标，该指标扣除了 GNP 中的“坏”产出，比如污染，并增加了休闲娱乐等非市场活动。他们证明，与一个工作较多（因此创造出更高的 GNP）、休闲较少的社会相比，一个休闲较多、工作较少的社会的福利与前者不相上下。

最近出现的一些计量方法试图引入范围更广的一系列“生活质量”指标。问题在于，你可以统计员工人数，但难以计算生活质量。如何加总一些关于“生活满意度”指标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因此，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使用“福利”的量化指标。

然而，另一项发现也开始影响目前这场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在

同一个国家，穷人没有富人幸福。换句话说，在财富超过一个低水平之后，人们的幸福水平不是由他们的绝对收入所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与某些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收入所决定的。我们总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作比较，要么感觉胜出，要么感觉不如，这和我们的收入水平无关；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

换句话说，决定生活满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而是中位数收入（即普通民众的收入）的增长速度。以一个十人群体（比如，一家工厂）为例，总经理每年赚 15 万美元，其他九名工人每人赚 1 万美元。他们的平均收入是 2.4 万美元，但 90% 的人只能赚 1 万美元。在这样的收入分配模式下，经济增长要是会提高普通民众的幸福感才怪。

平等社会使人满足

这并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例子。在过去 30 年里，富裕社会的平均收入稳步上升，但中位数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少数人——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是极少数人——攫取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果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要的不是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平等的社会。

更加平等的社会不仅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使人更加健康，从

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秦 晖

现在讲的福利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谢，不搞老百姓要问责，这和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搞福利无关，不喜欢也得干。

最近，欧洲福利国家闹危机。希腊福利开支太大，老百姓也没感谢政府，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借债太多，支撑不了，老百姓就抗议。但是，很多人由此说“可见福利国家搞不得，搞福利就造成大问题”，却值得辨析。这事到底怎么造成的？

福利国家 VS“强权国家”

在现在的西方语境中，“福利

国家”和“自由放任”是对立两极：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但最早的“福利国家”，反义词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强权国家。

1920年代，福利国家作为德语名词出现，Wohlfahrstaat，是贬义词。当时德国极右翼分子，后来成为纳粹基础的一些人，用这个词来骂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你们只懂讨好老百姓，搞虚伪的妇人之

而使人感到满足，还会使人参加更多的休闲娱乐活动，花更多时间陪家人和朋友，得到同伴的更多尊重，拥有更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也会增加人们的满足感。严重的平等会让我们产生比正常情况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想到我们比别人拥有得更少。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出人头地的社会，身边是狼爸和虎妈，时刻鞭策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奋勇争先”。

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有一个比较文明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人类生存的最可取状态就是

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有类型……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念……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好的状态是，没有人贫穷，没有人相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如今，这一经验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遗忘。不过，不丹国王还记得，那些认识到以财富作为衡量标准存在局限性的人也记得。

（摘自《参考消息》，
原载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络）

仁。不懂让老百姓为伟大的德国而奉献，你们搞的是福利国家，我们要的是伟大的德国。这些批评福利国家的人，并不主张自由放任，而是搞纳粹那一套。

1930年代，“福利国家”概念传到英语国家，成了褒义词。1930—1937年，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都有人用这个概念形容民主国家，“福利国家”的反面是什么？这时也没说是“自由放任”，而是“强权国家”。

这概念能在二战中广泛普及，1940年代的英国宗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年轻时是工党成员，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社会福利。二战期间，他写了《教徒与公民》一书，影响很大。其中提到两个概念：Welfare state 与 Warfare state，这在英语中是一个语言游戏，Welfare 与 Warfare 发音相近，但按他的说法，意思完全相反。Welfare state 是福利国家，他解释是“民主国家要为老百姓提供福利”。Warfare state 是战争的意思，指的是军国主义，1940年代正是二战时期，指的是意大利、德国、纳粹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国家。他说福利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是对立的，没提到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对立。

走向“问责型福利观”

尽管这位大主教说 Welfare state 是搞福利的，Warfare state 是搞

军国主义、让老百姓当战争炮灰的，可当时的纳粹和意大利都有相当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也不是光打仗。同时，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二战特殊时代也在全力以赴地打仗。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坦普尔没说得很清楚。在我看，有三个区别非常明显。

第一，现在讲的福利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谢，不搞老百姓要问责，这和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搞福利无关，不喜欢也得干。在宪政制度下，福利是一种责任。瑞典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但政党轮替，也有很多次是自由党或右翼政党执政，它们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也得做，因为这是由老百姓决定的。

斯大林搞福利是皇恩浩荡，搞一点老百姓就高呼万岁，不搞也不能要求他。福利不是责任，而是恩赐。这种观念，当然主要是由专制主义造成的，但有时一些“卸责右派”也帮了忙，他们再三讲国家不必尽这种责任，老百姓应该“不找市长找市场”，什么教育呀医疗呀都不能麻烦政府。既然他没这个责任，他还给了你这不就是额外恩赐了吗？所以你要感恩。

第二，公共福利是一种二次分配手段，在民主国家由多数决定。一般都是正向分配，指向平等。区别只在于，一些国家比较倾向于（注意是选民倾向于，并非统治者喜欢）自由放任，实行低福利制度。

另一些国家的选民选择了高福利制度,平等的功能就很强。所谓低福利,一是覆盖率低,只照顾那些最穷的。比如美国有福利房,但通常只给失业者,一般人没申请资格。而高福利国家的福利覆盖率很高,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全民共享,在有些国家任何人都可申请住房福利,但在有些国家条件很苛刻。然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只给官员分房,穷人反倒没份,这不可想象。二是同样受照顾的穷人,低福利国家照顾得少一点,高福利国家照顾得多一点。北欧高福利国家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往往会下降一半。美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下降得很少。但没有一个国家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是上升的。

可另外一些国家福利和特权挂钩,具有非常强烈的等级性。在这些国家,福利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待遇,包括用车、住房、医疗。这种福利的最大特点是,强势者初始分配占了一次便宜,二次分配再占一次便宜,弱势者初始分配受损失,二次分配再受损失。这是福利反向调节,这种国家面临的不是高福利与低福利的问题,而是“负福利”的问题。

假如福利有平等的功能,在最差的情况下平等功能等于0,是“零福利”,即自由放任。但负福利国家是扩大不平等,岂止零福利而已。自古以来,我国的强势者就主要不是靠初始分配,而是靠特权“待遇”

来显示地位的。历史上,谁知道皇帝领多少工资?皇帝往往根本无所谓工资,在“初始分配”上他与乞丐几乎是“平等”的。但乞丐饿死没人管,而皇上“从摇篮到坟墓”都狂吃国家的,还包三宫六院,享受“供给制”下的奢侈生活。皇上还发福利,当然是论功行赏,先发给一定级别的权贵。

奥巴马上台后就要搞医改,很多人批评美国医疗,这么富的国家还是有人看不起病。但在美国谁看不起病?是穷人吗?不是。美国是低福利国家,覆盖面很窄,按现在看到的数字(各州情况不一样),美国联邦财政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18%,有些州还有州提供的。这18%主要包括两个项目:一个医疗保险,这个项目标准是对65岁以上的老人全部负责;另外一个则是医疗补贴,专门针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其他人国家基本不管。

欧洲国家不一样。比如英国不仅国民全覆盖,学生在英国待半年以上就可享有。而美国没有,所以多数人只能买商业性医疗保险,但比较贵。如果有些人仗着身体好不买医疗保险,一旦有病去看医生,的确是奇贵,以致有人看不起病。但这些人不是美国最弱势的群体,而是中下阶层。这些人没穷到可以享受国家医疗福利的地步,又不愿买商业保险。

奥巴马推行医改,要赢得多数人支持不是很容易。富人不愿,因

为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富人也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美国穷人也不愿意,因为那 18% 的人已经有了保障,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医改。只有中下阶层是奥巴马医改的支持者。

第三,既然民主国家的福利是国民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这种福利就显然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是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似乎类似的事,如果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那就是福利,假如是政府强加于百姓,那就不是了——当然,不是说政府不能要求于百姓,只是这种事不能叫福利而已。

例如同样是老百姓干活儿,如果是老百姓要求政府保障就业、搞培训、增加岗位等等,当然带有福利含义。但官家抓老百姓去干活,就像秦始皇把孟姜女老公抓去修长城,那就不是福利了。穷人要求政府以廉租房与福利公屋来改造“贫民窟”,那是福利,而政府用铁腕“城管”拆掉穷人的“违章建筑”并赶走穷人来“消灭贫民窟”就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是福利,强制性抓捕流浪汉的“收容遣送法”就不是。国家承担责任提供养老保险是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终老而不许留在城里“给政府添麻烦”就不是。

以上三条归根结底,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而反过来讲,争取福利问责就是通向宪政民

主的一条重要道路。改变我们的福利观念,从“感恩型福利观”走向“问责型福利观”,这对我们走向宪政民主非常重要。

买多少菜给多少钱

有人把福利国家和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或者说搞福利会导致专制,或者说不专制就会失去福利。两者似乎一“右”一“左”,其实作用却是一样的。

而我们知道所谓宪政机制,实际上就是通过限权问责而实现权责对应的机制。

在权大责小的旧体制下,“为福利而问责”与“为自由而限权”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在向宪政走近,其意义决不下于扩大直接选举等等。在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的情况下,走向宪政得通过制度上的改变,但首先要有观念上的改变,要在每件事情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宪政制度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于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在宪政条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我和保姆之间的契约,我希望她买多少菜就给她多少钱。

当然,我家两口子对此会有分歧:太太要求保姆多买点菜,因此要多交给她钱。而先生不愿让她处置这么多钱,也就不能要求她买太多的菜。那么保姆怎么办?等你们吵出个结果来,给多少钱我买多少菜就是了。

国家也是一样，有人愿要大政府，要求它多服务，就愿意多授它一点权力；有些人愿意要更多自由，不愿给它太大权力，也不能要它承担太多责任。高税收高福利或低税收低福利，到底怎么办？竞选出个结果，谁赢就照谁的办就是。这是一种制度安排。与之相对的非宪政制度，或者说是专制制度则相反，权力不受限，统治者想横征暴敛就可横征暴敛，责任不可问，皇上给你点福利你就得感谢，不给你不能问他要。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走出这种状态呢？

很多人说，宪政制度是一种财政体制，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是渐进民主。可政府凭什么愿意搞预算公开？动力从何而来？从宪政制度的历史看，从最早英国、法国出现宪政一直到后来的波兰、匈牙利率先走出铁幕，有个共同点：这些国家都是被赤字逼出宪政的。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愿意向公众晾账本？如果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想不给你就不给你，钱都留下我自己花，他愿意晾账本吗？不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会主动晾：他向你收钱，你大声埋怨，使他收不到多少钱，你又逼他花很多钱，必须从摇篮到坟墓都负责。这样两头逼，总有一天他受不了就会晾出账本。

有人说高福利国家不好，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太高等等。他们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限制责任的前提是限制权力，权力无限责任就

该无限。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宪政体制下，不应提出从摇篮到坟墓都要国家负责，但在非宪政国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样，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宪政国家可以为了搞福利支持高税收，但在非宪政国家他能支持皇上横征暴敛吗？笑话！你去看看 19 世纪欧洲非宪政国家与向宪政过渡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抗议高税收比自由主义还积极！自由主义者最核心的观念是权责对应：不要求你负那么大的责任，前提是不希望你有那么大的权力。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核心观念并无不同，只是推出的诉求相反：给你多授点权，前提是我要更严厉地向你问责。

很多国家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启蒙的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英国、法国最早出现宪政，不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写了很多文章，而是皇上需要很多钱，财政亏空一塌糊涂，实在没办法让老百姓纳税，不得不开国会跟纳税人商量，在时而暴烈时而温和的讨价还价中，宪政就出来了。东欧也一样，波兰、匈牙利率先走向宪政，共同的特点是这两国的赤字在东欧最高，非常重要的杠杆是老百姓对政府实行福利问责，政府必须提供这、提供那，提供了不感谢，不提供就抗议。

福利要求的力量

现在有人常把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相联系，如果这里说的是政治